



印尼研究

在台灣學界開花結果

歐美印尼研究

印尼研究（Indonesia Studies）在歐洲、美國、日本、澳洲等國家很早就受到政府及學術界的重視，尤其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印尼研究在上述國家發展迅速，不但大學裡開始開設有關於印尼語文、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等課程，同時也在校內或校外成立各式各樣的印尼研究中心（Indonesian Studies Center）或印尼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donesian Studies）。戰後，在上述國家之印尼研究能夠蓬勃發展，是有許多背景因素、動機、需求和有利條件。

首先，印尼在戰後，尤其是戰後世界進入東西方冷戰時期，它的領土幅員、戰略位置、天然資源、衆多人口已經成了美國、蘇聯兩大敵對陣營互相爭取的對象。基於這一考量，美、歐、日、澳等國家政府每年撥出相當的經費來推動東南亞及印尼研究的學術領域，印尼也因而成爲這些國家加強研究的對象了。政府帶動了印尼研究的氣氛。

印尼研究在歐洲及日本發展得較早，研究成果也比美國遙遙領先，尤其是在歷史、語言、藝術、宗教及社會等方面，歐洲及日本學術的研究基礎相當深厚，也具水準。不過，美國政府及企業界憑著雄厚財力及熱心，不遺餘力的贊助、鼓勵印尼研究之發展，終於如願以償，使美國在戰後趕上歐洲和日本，成爲印尼研究的學術重鎮。

美國一流學府，如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康乃爾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文化研究中心等，不但擁有一流教授印尼



作者 ■ 區鉅龍

出生印尼井里文，長於巨港。政治大學西語系畢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大學外交系印尼文教授退休。



課程的老師，豐碩的印尼研究圖書資料收藏，更與印尼主要學府建立了各種學術及教學、研究合作關係。戰後這些學府也為美國培養了許多傑出印尼問題專家學者。六〇年代台灣赴美國專攻印尼問題的留學生（包括筆者在內），都是這批戰後美國印尼學者的學生。其中佼佼者包括George Cahin, Robert Sealapino, Donald Wirthheim, William Skinner, Donald E. weatherlee等。他們許多人都曾應邀在印尼各主要學府擔任客座教授，可見印尼學界對他們的尊敬和重視。

越戰時期，無論是東南亞研究或者印尼研究領域進入了更廣泛，更深度、更有系統、更精細研究階段。印尼研究在美國、歐洲、日本及澳洲更掀起了新的熱潮。迄今，東南亞協會國家組織的成立和活動，以及東南亞邁向區域經濟，貿易、政治、軍事等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更凸顯了印尼在這地區的「龍頭老大」地位，同時也提升了印尼研究的重要性。

印尼研究在台灣

台灣由於歷史發展特殊，在荷蘭短暫佔領時期以及日據時代，對印尼只有少許的研究，所留下的有關印尼研究文獻也不多。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九年遷台之後，因為政府的整個外交政策偏重在美國及日本，因此學術研究產生「重美輕亞」的心態。當然，政府財力有限，同時當美、日也是台灣主要盟邦，而且東南亞國家相繼與中國建交，使得東南亞及印尼在台灣成為學術冷門。政府不僅沒有撥出經費來支持推動東南亞研究，各個主要學府及民間學術團體更是缺乏資源和興趣來印尼研究了。

六〇年代在台灣早期從事印尼研究的學術機構寥寥無幾，當時比較有規模的印尼研究學術單位是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它不單擁有一批

研究印尼的專家學者，同時也有較多的當代印尼研究文獻，定期發表有關印尼政治、外交、經濟等的研究論文。不過，這時期老一輩的印尼研究專家學者，很少曾經在美國或歐洲留學，而且大多數都已五十歲出頭。他們主要對印尼有研究興趣，而且長期觀察印尼的局勢和動態。因此，雖然他們未曾接受過西方系統性的研究理論和分析方法，憑著他們對印尼事物的長期觀察和分析，他們所累積的研究成果成為台灣早期印尼研究珍貴的參考資料和文獻。他們之中有許多也在台灣各個大學兼課，把他們對印尼的認識和瞭解傳授給年青學生，他們在啓發台灣的印尼研究，功不可沒。



台灣新階段的印尼研究

台灣的印尼研究雖然起步很晚，但一般國人對印尼的認識和瞭解與日俱增，尤其是八〇年代當台灣與印尼的經貿關係、旅遊交往等逐年增加，台灣同胞對印尼的文物和局勢更加有興趣和關心。六〇年代印尼不時發生排華暴力事件，台灣媒體立刻直接轉播排華暴動的畫面，使國人對印尼產生了又恐懼又好奇的矛盾心態。國人一方面羨慕印尼領土遼闊。天然資源豐富，另一方面則不瞭解為何印尼會不時發生排華事件，這時期大多數國人對印尼的直接印象比較負面性得多。

九〇年代中期，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協助台商前進東南亞地區創業發展，利用該地區的廉價勞力和低生產成本來協助台灣中小型企業家發展出第二春，政府於一九九三年正式透過立法程序開始推動我國的「南向政策」(Go South Policy) 其中又以印尼為積極爭取和開發的對象。

這時期政府的南向政策，無形中也帶動了國內研究東南亞，特別是研究印尼問題的新學術動力和氣氛。在政府規劃和贊助之下，東南亞研究中心紛紛在各個主要學府成立，例如在淡江大學成立東南亞研究所，在南投縣成立暨南大學並開設東南亞研究所，在政大國關中心分設亞太研究等。此外，許多民間研究機構，如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綜合研究院等均紛紛加強對東南亞及印尼之研究。

這新階段的印尼研究，有許多值得回顧和讚許的成果。首先，這新階段從事印尼研究的年青學者專家，大多數曾留學美國、歐洲、澳洲和日本一流學府，且擁有博士學位，而且都受過嚴格正規的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論，這點與六〇年代早期研究前輩的研究資歷不同。簡單來說，年青一代的印尼學者專家研究的領域比較專精，研究方法較為科學而嚴謹，同時，因為他們精通外文，他們所蒐集的研究文獻也比較廣泛，研究分析較具理論基礎，也比較客觀和科學化。無論他們專門研究印尼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都具有該領域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論，其所得研究成果，自然超越了早期前輩研究心得。

此外，九〇年代開始，台灣各個學術機構也同時出版專門討論東南亞的月刊或雙月刊等，為年青學者提供了發表研究成果的新園地。

過去二十多年來，各個大學研究生撰寫有關印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碩士或博士論文逐年增加，不但研究主題有學術價值，分析也很專精，不遜於外國研究生。此外，各個國內東南亞研究所每年定期輪流主辦有關東南亞地區的學術研討會，提供國內研究東南亞學者專家聚集一堂交換研究心得的難得機會。同時也邀請東南亞知名學者專家出席會議，會後將所有論文編排成專輯，提供各界參考。國內許多東南亞學者專家也應邀成為政府各部門的諮詢顧問，使學術和實際政策結合。

總而言之，六〇年代時期，台灣的東南亞研究是一片沙漠，如今經過政府民間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貢獻出財力與學術經驗心得及研究成果，終於開花結果，得來不易。

筆者很榮幸能夠親身參與以及目睹印尼研究在國內開展成長、發芽、成熟。尤其很榮幸有機會致力加強印尼台灣學術的聯繫與合作。近七十年來，筆者至少帶領過六批國內學術團體訪問印尼主要學府如國立印尼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天主教三聖大學(Universitas Trisakti)、搭路拿大學(Universitas Tarumanegara)、加雅瑪達大學(Universitas Gaja Mada)以及主要智庫如印尼國際暨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udies)、哈比比研究中心(Habibi Center)以及印尼國防研究院(Lemanas)等。

最令筆者感到榮幸和難忘的是在參與加強我國與印尼的學術合作交流期間，讓我有機會認識一些印尼名學者和政界要員，其中包括蘇哈托時期前印尼外交部長Anak Agung Gede Agung、瓦希德時期前印尼外交部長現任印尼尤托總統中東事務巡迴大使西哈博士(Dr.Alwi Shihad)、前國會議長哈默克(Harmoko)、前哈比比總統首席外交顧問Dewi Fortuna Anwar、現任國會國防委員會主席Sambunpaga、前教育部長Malik Fajar等不勝枚舉。和他們拿晤，交換意見，增進了我對印尼局勢的瞭解，對他們提供的珍貴意見，迄今仍感激難忘。



台灣印尼研究仍待加強之處

印尼研究在台灣已具初步成果，各界的努力功不可沒，但是，展望未來，仍待努力之處仍多，其中包括：（一）加強研究者之印尼語文訓練和能力。目前一般國內印尼研究學者專家主要依靠英文等外語研究文獻或翻譯著作為研究文獻之參考，如果能直接蒐集第一手印尼文原始資料，必然更有助提升研究深度和參考價值；（二）政府和民間企業界應更積極提供資源來推動國內印尼研究之風氣，因為無論是政府政策之需要或企業界的工商資訊需求，都需要學界來研究分析供決策參考；（三）台灣需要成立印尼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Studies)，一方面提供相關學者專家隨時聚會之學術場地，另一方面作為加強我與印尼學術界交流合作之橋樑：

- （四）出版定期的印尼研究期刊；
- （五）加強相關系所的印尼文教學等。所幸現在電腦網路資訊發達，便利我們隨時取得有關印尼各方面的第一手訊息。這是印尼研究者的一大福音。

